



从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看夏文化概念

梁 云 李盼盼

摘 要:根据墓向葬俗可将含墓葬遗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以北向墓为主,乙类以南向墓为主,丙类北向、南向墓比例大体相当,三类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规律。经分析可知该文化的北向墓和南向墓分别代表了不同人群,该文化的人群构成是以北向墓人群为主,南向墓人群为辅。参考夏、商、周三代皆流行北首葬的文献记载,以及夏遗民墓葬的考古发现,可知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族。文献又记载了彭姓的韦和己姓的顾、昆吾等夏之与国,考古发现周代彭姓、己姓贵族墓为南向墓,可推知二里头文化的南向墓人群为彭姓、己姓部族;这些部族擅长制陶、铸铜、绿松石工艺。夏王朝的兴起开始于姒姓夏人与部分“祝融”后裔的联盟。“夏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分别是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两个层面的定义。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北向墓;南向墓;人群构成;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21-10

通过多年对二里头文化族属的探讨,邹衡倡导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二里头文化的人群,即该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除了夏族之外,是否还包含其他族群?这既涉及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关系问题,还关系到“夏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我国学者早已注意到,一个考古学文化包含的族往往不止一个,它可以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使用。从周代考古的实例来看,一个考古学文化包含多个族群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周文化中既有周人,也有殷遗民;秦文化中既有秦人,也有周余民。而不同族群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区分开来,因为包括墓向、葬式、墓形、殉牲、随葬品选择及摆放等方面在内的“葬俗”与人群共同体的关联性最强,是识别族属、判断族源的有效标准,在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①。鉴于

此,本文拟根据葬俗对二里头文化遗址进行分类,辨析出该文化的两类人群,探讨两类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族属,并就此讨论“夏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一、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类与人群构成

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墓葬有500多座,其中二里头遗址内有400多座,其他遗址内共100多座^②。根据墓葬的墓向和葬式^③,可将含墓葬遗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分为三类。

甲类:以北向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或占绝大多数,其他墓向或葬式较少,如偃师二里头、巩义稍柴、伊川白元、郑州洛达庙等遗址。其中二里头遗址目前有资料可查的墓葬共163座^④,如果排除情况不明者,该遗址墓向、葬式清楚的墓以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北向占比60%,头

收稿日期:2023-05-30

作者简介:梁云,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李盼盼,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向 $331^{\circ}\sim 6^{\circ}$;南向次之,占23%,头向 $168^{\circ}\sim 191^{\circ}$;仰身直肢葬占比58%,俯身直肢葬次之,占9%。在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的二里头文化墓葬16座,其中北向墓8座,南向4座,东向3座,西向1座;仰身直肢葬13座,侧身屈肢葬2座,俯身葬1座^⑤。

乙类:以南向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或占绝大多数,其他墓向或葬式较少,如伊川南寨、新郑望京楼、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洛阳东马沟、洛阳东杨村等遗址。其中在伊川县彭婆镇南寨遗址发掘了25座二里头文化墓葬,年代从该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简报介绍的墓葬均为南向墓^⑥,头向 $144^{\circ}\sim 180^{\circ}$ 。在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内城居住区清理该文化墓葬15座^⑦:其中南向墓11座,占73%,头向 $175^{\circ}\sim 207^{\circ}$;仰身直肢葬13座,占87%。在荥阳西史村遗址发掘墓葬6座,均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⑧。在洛阳东马沟清理二里头文化墓葬11座,完整的7座^⑨,其中5座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头向 $160^{\circ}\sim 180^{\circ}$ 。在洛阳吉利公社东杨村发掘了7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墓葬,除了1座头向西的仰身直肢葬、2座头向南的俯身直肢葬,其他4座皆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⑩,头向 $184^{\circ}\sim 202^{\circ}$ 。

丙类:北向墓和南向墓所占比例大体相当,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其他墓向或葬式很少,如登封南洼、登封王城岗、商洛东龙山等遗址。其中在登封南洼清理19座二里头文化墓葬,北向墓9座,占47%,头向 $0^{\circ}\sim 20^{\circ}$;南向墓10座,占53%,头向 $180^{\circ}\sim 200^{\circ}$;除了一具人骨为仰身屈肢,其

他皆为仰身直肢葬^⑪。

此外,在浙川下王岗、洛阳东干沟、偃师灰嘴、澠池鹿寺、澠池郑窑、郑州上街、邓州穰东、驻马店杨庄、西平上坡、平顶山蒲城店等遗址,或者为瓮棺葬,或者发现墓葬数量过少,不具备统计意义,因此暂不归类。

三类遗址的空间分布有一定规律(图1):甲类占据了伊洛盆地北部居中的位置,并控制了盆地东端至黄河河谷的出口通道,在盆地外围东侧、西南也有分布。乙类主要分布在盆地的东西两翼,西翼的三处遗址分别控制了从黄河、洛河、伊河进入盆地的入口,东翼的三处遗址构成了盆地东侧的外围屏障。丙类分布在嵩山南麓的颍河上游,及盆地西约260公里的洛河上游。

从周代考古的实例来看,不同的族群,往往有不同的墓向习俗。如周人自西周初至战国长期流行头北足南葬式,秦人自西周中晚期至秦代长期流行头西足东葬式,楚人从春秋至战国长期流行头东足西葬式。二里头文化墓葬虽然缺少出土文字资料说明其族属,但不同的墓向应代表了不同的族群。

北向墓、南向墓各有自己的遗址,即甲类、乙类遗址。乙类遗址的数量甚至稍多于甲类。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即便将来发现更多的甲类遗址,乙类遗址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南向墓人群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里头遗址以北向墓居多,还有一定比例的南向墓。两类墓在该遗址中不是随机交错地混杂在一起,而是有各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即便



图1 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

在共存的区域,两类墓也一般各有自己的墓区或墓群,表现出聚族而葬的特点。从竖穴土坑墓在该遗址各区分布情况(表1)可以看出:北向墓在

遗址中分布最广,而南向墓如果不算Ⅲ区的一座,只见于Ⅳ、Ⅴ、Ⅸ区,基本不见于北向墓数量最多的Ⅵ区。两类墓在Ⅳ、Ⅴ、Ⅸ区共存。

表1 二里头遗址各区竖穴墓墓向统计表

遗址分区 墓向	Ⅱ区	Ⅲ区	Ⅳ区	Ⅴ区	Ⅵ区	Ⅷ区	Ⅸ区	合计
北向	4	8	9	18	20	1	6	66
南向		1	6	8			10	25
南北				1	5			6
东向				2			1	3
西向				3				3
东西			1					1
不明		1		4		1	3	9
合计	4	10	16	36	25	2	20	113

2003—2004年发现位于遗址宫殿区外围四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和宫城城墙,宫城总体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②。近年发现“井”字形主干道继续向外延伸,干道两侧有墙垣,将整个遗址分割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形成“九宫格”式的布局^③;宫殿区在中心,祭祀区在其北,围墙作坊区在其南。宫城周边的Ⅲ、Ⅴ、Ⅵ、Ⅶ、Ⅷ、Ⅸ区,均发现基址及墓葬遗存,发现者认为这些不同区域归不同的家族或集团所有^④。

在这些区域中,宫城东及东北的Ⅵ、Ⅲ、Ⅴ区应属北向墓人群,宫殿区亦属之。Ⅵ区似乎是北向墓人群的专属区域,1980年在该区发现小型半地穴式房基及小型墓葬,墓葬均为北向墓^⑤;1984年在该区清理了一座大房基和十余座墓葬^⑥,墓向皆为北,墓葬排列有序,级别较高,应为贵族生活区及墓地;1986—1987年又在该区清理了房基、灰坑、墓葬^⑦,死者一般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又是一片贵族生活区及墓地。

其中在Ⅵ区发现的祭祀遗迹,即在一般直径约5米凸起于地表的圆形土坛上,布列一或两圈圆形“土墩”^⑧。坛面和坛下有路土,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1987年发现土坛西侧1米处有一座中型墓(M58),为南北向墓形,随葬铜爵、漆器、陶礼器等^⑨。学者们认为这类遗迹属于“坛祭”^⑩,以祭祀日神、司暑神、山岳神等阳性的神灵。这类遗迹位于北向墓人群的生活区或其墓葬附近,可能是专属于北向墓人群或由其负

责的祭祀场所。

在Ⅲ区发现的墓葬较为零散,但墓向清楚的绝大多数为北向。

历年在Ⅴ区发掘的墓葬可分三处:一在该区的东北角、宫城外东北,头向、葬式清楚的均为北向仰身直肢葬。性质与Ⅵ、Ⅲ区相同。二是在该区的南部边沿,属于围墙作坊区,2座南向,属四期;1座北向,属二期。该处与Ⅳ区性质相同。三是位于宫城之内的宫殿区,宫殿区合计有北向墓9座、南向墓5座、南北向墓3座、西向墓2座、东向墓1座。在宫殿区北向墓的数量居多,规格较高。在3号、5号基址院内路土层中发现多座成排贵族墓,为基址使用时期的遗存,头向清楚的均为北向。其中2002 V M3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级别最高的墓葬。南向墓级别较低,多为小型墓,不见随葬铜器、玉器和绿松石,甚至无随葬品;东西向墓亦然。由此可见,宫殿的拥有和使用者是北向墓人群。宫殿区北向墓多属于二期(5座),南向墓多属于四期(4座),而且不少属于四期晚段。有四期墓葬打破宫殿台基、宫城围墙的现象。考虑到宫殿区在四期晚段废弃,宫城废弃后铸铜和绿松石作坊转换主人继续使用,大部分四期墓葬应是宫殿废弃之后的遗存。

宫城以西、西南的Ⅷ、Ⅶ区仅发现零星墓葬,归属不明。宫城西北的Ⅸ区虽也发现有北向墓,但可能是以南向墓人群为主的区域。

1982—1983年在Ⅸ区中部东缘发掘了二里头文化二至三期的墓葬21座,墓葬排列有序,其中4座墓葬式不明,M11—M21中除M18头向东外,余均为南向墓,其他6座为北向墓^[1]。这些墓显然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墓区(或群)。

Ⅸ区确实是南向墓人群重要的活动区域。1994—1995年在该区普遍发现可能用于祭祀的半地穴式遗迹单位;发现有排列整齐的墓葬,这些墓葬除了小孩墓外,皆头向南。这类坑被认为是“坎祭”,以祭祀月神、司寒神、川谷神等阴性的神灵;墓葬与祭祀活动有关,又被称为“祭祀墓”,墓主可能是祭司^⑨。该区“坎祭”可能是专属于南向墓人群或由其负责的祭祀场所,与Ⅵ区西部的“坛祭”遗迹均位于宫殿区北面,二者东西连绵分布,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祭祀区。

宫城以南的Ⅳ区是围垣作坊区,是两类人群共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地方,但各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墓区。如1982—1983年清理的Ⅳ区南部的50座小墓,除发掘区东边的6座头向北,其余的成人及部分儿童墓皆头向南。1984年清理的40余座墓,可分成南、北两区:北区成人墓中除一座外皆头向北,南区成人墓皆头向南。

在丙类遗址中,南向墓与北向墓也不混杂,而是各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墓区或墓组。如2004年春在登封南洼遗址清理的8座墓(图2),北侧一排墓主皆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南侧M1形制略大,死者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2]。

北向墓人群占据了中心都邑(二里头遗址),所包含的贵族墓数量最多,无疑是二里头

文化居统治地位的核心族群。

二里头文化的聚落遗址可以分为五个等级,甲类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为第一等级。乙类的望京楼城址面积约168万平方米,仅次于中心都邑,为第二等级。甲类的稍柴遗址面积60万平方米,乙类的大师姑城址面积51万平方米,均为第三等级。甲类的白元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乙类的南寨遗址面积24万平方米,丙类的南洼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为第四等级。乙类的东杨村遗址面积16万平方米,西史村遗址面积9万平方米,为第五等级。从遗址的等级分层看,南向墓人群的地位并不低微,仅次于北向墓人群。

二里头文化墓葬自上而下可分为五级,如表2所示,随葬铜礼器的Ⅰ级墓仅见于北向墓。随葬陶礼器的Ⅱ级墓在北向和南向墓中都比较多见,个别见于其他方向的墓葬。随葬日用陶器的Ⅲ级墓和无随葬品的Ⅳ级墓见于各方向的

表2 二里头遗址各级别墓葬的墓向统计

等级 墓向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北向	17	27	19	6	6
南向		13	6	6	5
东向		1	1	1	7
西向			2	1	2
南北		2	2	2	
东西				1	
东北					1
不明	11	3	4		17
合计	28	46	34	17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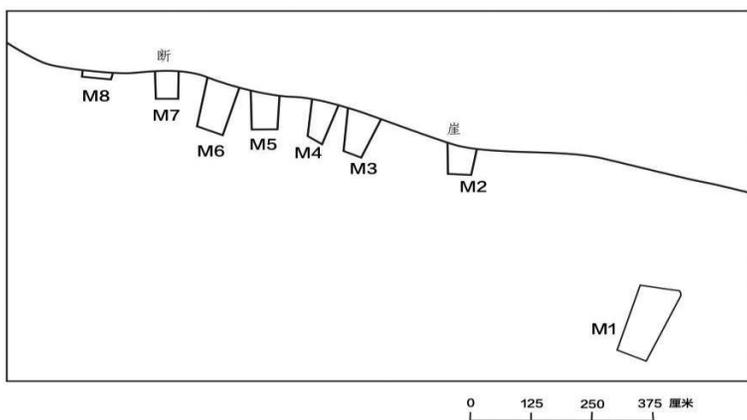


图2 南洼遗址Ⅱ区M1~M8位置^⑩

墓葬。乱葬的V级墓人骨头朝各方向的都有。从墓葬的等级划分来看,南向墓人群的地位也仅次于北向墓人群。

南向墓人群地位稍低于北向墓人群,但有相对独立性,又与后者关系密切,应是臣服于后者的盟友或附庸。乙类遗址分布在洛阳盆地的东西两侧,尤其是东侧的两座城址,有明显的军事守卫性质;南向墓在国都的祭祀区和围垣手工业区都有分布;说明南向墓人群包含了驻守边区的军事首领、祭司和手工业者。二里头文化以北向墓人群为主、南向墓人群为辅的人群构成关系,至迟在该文化二期已经形成,并且较为稳定地延续至四期。

二、两类人群的族属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目前学术界主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不可分割,是首尾完整的夏文化,在它之前和之后的文化遗存都不属于夏文化^②;另一种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但认为夏文化的上限应前推至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前,早期夏文化包括新砦期文化,甚至包括王湾三期文化的晚期遗存^③。换言之,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完整历史阶段或中晚期阶段的夏文化。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墓向习俗,《礼记·檀弓下》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孔颖达疏:“言葬于国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暗,往诣幽冥故也。”^[3]即认为北方是幽冥所在,灵魂归宿,死者头向北为灵魂往赴指示了方向。“达礼”即通行的礼仪。

这条记载已经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众所周知,姬姓周人的传统葬式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历年发掘的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Ⅱ区)、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陕西沔西张家坡井叔墓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姬周诸侯墓地莫不如此。2004年在岐山周公庙遗址的陵坡墓地发现西周时期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0座,带三条、二条、一条墓道的大墓各4座。学术界目前一般认为周公庙遗址为周公的采邑,陵坡墓地为周公家族墓地^[4]。由

于周公的特殊历史地位,其家族被特许享用天子的葬制。该遗址带墓道的大墓以南墓道为主墓道,中小型墓亦为南北向。2001年在洛阳市体育场路发现一座春秋早期的亚字形大墓CIM10122,方向1°;南墓道最长为主墓道^[5]。该墓严重被盗,但残存“王作鬲鼎”“王作鬲彝”铭文的铜鼎和鬲,可知墓主为一代周王。周王陵应与姬周诸侯墓一样,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式。

商人墓多为北首向,在殷墟发掘的中小型墓的墓向不一,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人群结构混杂,但还能看出北向墓所占比例最大。带墓道的大墓则反映了商人嫡系或者王室贵族的情况。杨锡璋统计在殷墟“共发现了带墓道的大墓三十二座……除大司空村有两座一条墓道的墓其墓道是在墓室北侧外,其余全在南侧,即有三十座是北向的。但是,这些墓并不是正北向的,而是北偏东。因此,可以说,殷代王室和高级贵族墓的方向,绝大多数是北偏东的”^[6]。殷人有尊崇东北方位的传统,墓向是其表现之一。

考古发现的商、周王室贵族墓均为北向墓,证明《礼记》所言不妄。由此可知夏王族亦流行北向墓。

夏亡后,姒姓的夏遗民族群依然存在,并延续到商周时期。《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冥氏、斟(氏)戈氏。”^[7]⁸⁹《潜夫论·五德志》:“姒姓分氏,夏后、有扈……费、戈、冥、缙,皆禹后也。”^[8]曹定云曾系统收集商代“戈”及其组成的族徽,认为它是禹之后裔所使用的族氏徽号,而夏部族是确实存在过的群体^[9]。1991年在陕西泾阳高家堡发掘了6座西周早期墓葬,其中M5、M6为长度2米左右的小型墓,前者为北向墓,后者为东西向墓;其余M1—M4为长度3米以上的中型贵族墓,随葬铜器多带“戈”形族徽,说明这是一处戈氏家族墓地^⑤。M1—M5的墓向一致,为345°或344°,死者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式。戈氏为姒姓夏人后裔,由其墓向葬式可以推知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族。

乙类遗址中的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两座城址位于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东界,被认为是夏王朝东境的军事重镇,或其附属方国的都城^[10]。

其中大师姑可能是韦国都邑^[11],望京楼可能是昆吾之居^[12]。《诗·商颂·长发》记载汤伐桀进军路线由东而西,“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两城址的地望与之吻合^[13]。早在20世纪70年代,邹衡就考证顾在郑州附近,韦就在郑州,昆吾之居很可能在新郑附近,而孟家沟(即望京楼)和曲梁两处遗址尤其值得注意^[14]。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他的研究极有预见性。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么除了姒姓夏族,二里头文化还包含韦、顾、昆吾等族。

韦为彭姓,顾、昆吾为己姓,均属“祝融八姓”。《诗》郑笺:“韦,豕韦,彭姓也。”^[15]《国语·郑语》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末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鬻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16]466-467}祝融八姓的记载又见于《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拆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7]1690}昆吾氏在夏代为侯伯,地位自然很高。《风俗通义》记载夏太康怠政,昆吾氏为盟主,诛不臣者以尊王室。彭姓氏族也是夏王朝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彭伯寿曾辅佐夏后启平西河,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启)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临。”^[17]《逸周书·尝麦》亦云:“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18]可见有夏一代,彭姓、己姓族氏始终是姒姓夏人的羽翼和得力助手。

大彭、豕韦在夏亡后转而服侍殷商,再次兴起为商伯,但后来与商王室发生矛盾,至武丁时又被灭国。古彭国被灭后,子孙以国为氏,流散各地。其中一支迁至南阳,曾出仕申国,楚灭申后被任命为“申公”,管理申县。1975—2008年在南阳市西关附近发现楚国彭氏家族墓地,包括“申公彭宇”墓,“彭公之孙无所”墓,以及“彭射”墓,“彭启”夫妇、“彭子寿”夫妇的并穴合葬墓^⑤,共五组八座贵族墓,属春秋中晚期,按年代早晚自北向南分布,墓主人全部头向朝南,葬式为仰身直肢。彭姓(氏)流行南向的葬俗,由此可上推二里头文化的南向墓人群应包含韦(豕

韦)、大彭等彭姓部族。

己姓除了顾、昆吾,还有苏、温、董、番等氏族。番或为苏氏分支,西周时番躬生壶是番躬生为其长女“孟妃乖”出嫁所作媵器,“妃”即“己”,可知番为己姓。春秋时番国在河南信阳、固始、潢川一带,后来被楚国所并,族人成为楚之潘氏。潘氏最有名的人物是楚穆王的太师潘崇。1978年发掘的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带多级生土台阶的甲字形墓,墓道朝南;据墓内简文,墓主是郟阳君潘胜。该墓一椁三棺,椁分五室,以南室面积最大,北室最小;人骨无存,葬式不清。2000年又发掘了天星观二号墓,亦为墓道朝南的甲字形墓;椁分四室,有南室而无北室;墓被盗扰,墓主葬式不清^[19]。根据楚贵族墓椁内分室(箱)的规律,一般“头箱”对应的室空间较大,而“足箱”对应的室较小或者不设,如包山楚墓。因此,天星观楚墓墓主应为头南足北的葬式。潘氏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楚文化,但在墓向上还保留了本族的特点。由此亦可推知,二里头文化的南向墓人群也包含了顾、昆吾等己姓氏族。

《吕氏春秋·君守》云:“昆吾作陶。”邹衡曾引用《说文》“壶,昆吾鬻器也,象形”,与二里头文化的鬻底器相印证^{[14]142}。二里头文化陶器的成型工艺多样,装饰手法复杂,陶礼器造型优美,胎薄体轻,非专业工匠不能制作。除了制陶,昆吾氏还擅长青铜冶铸业,《墨子·耕柱》云:“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20]“陶铸”即用陶范铸造青铜器^⑥。文献记载昆吾之地产铜,《山海经·中山经》:“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21]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作坊集中分布在IV区,该区发现多座浇铸场所,为半地穴或地面式房子,有的场所在工作面或路土间还埋有墓葬^[22]。当时的手工业具有世袭性质,不同种类的手工业技能在不同氏族或家族中世代传承,以臻专精。文献记载昆吾氏擅长制陶、铸铜,与二里头遗址南向墓分布在围垣作坊区的现象相应和。

己姓、彭姓都有蓄龙的传说。《国语·郑语》韦昭注:“董姓,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有颺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扰龙服事帝舜,赐姓董,氏曰豢龙,封之鬻川,当夏之兴,别封鬻夷。”^{[16]467}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23]刘累从豢龙氏（董氏）处学会养龙，从而代替了豕韦的“御龙”职官。文献中的“龙”为何物难以考证，但在二里头文化中却屡见龙形象的遗存，包括陶器上刻纹、兽面纹的绿松石牌饰等；尤其是在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M3，死者胸腹间放置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其中部压一件铜铃；距龙尾端3.6厘米处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方向与龙身垂直^③。关于墓主的身份，被认为是主管祭祀龙图腾的“御龙氏”^[24]；或是驯养“龙”的专门人才，但不是王室成员^[25]；或是跳“万舞”的伶官^[26]。

以上说法多少有些低估了墓主的身份级别。二里头绿松石牌饰上的兽面纹也是龙纹，牌饰与龙形器有年代早晚的替代关系，后者属二期，前者属三至四期，二者皆与铜铃搭配成组合，可知它们为同一类器物。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发现3件绿松石牌饰，所出墓葬皆为长度2米以上的I级墓。随葬龙形器的M3为二里头文化前期级别最高的墓，有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王室成员或王本人^[27]，颇有道理。随葬龙形器、牌饰的墓皆为北向墓，应属姒姓夏族，与文献中彭姓的“御龙氏”和己姓的“豢龙氏”无关。“禹”字从虫、从九，“姒”字象蛇身自环，皆与“龙（蛇）”有关。龙形器为罕见的“重器”；牌饰的尺寸也不小，长15厘米、宽8厘米左右，系挂于死者胸前。这类器物有强烈的显示族别和身份地位的意义，很可能是夏王族的权杖或徽章，其拥有者即便不是夏王，也是王室显贵。

“御龙氏”“豢龙氏”其实是指绿松石龙形遗物的制作者，当然也泛指负责绿松石器生产的族氏。在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东北部存在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区，发现原料、加工工具、成品、半成品、次品、废料等^[28]，遗址IV区的南向墓人群应也从事此类手工业。文献记载“豢龙氏”与矿石有关，《史记·殷本纪》云：“夏师败绩，汤遂伐三豎，俘厥宝玉。”^{[7]96}“豎”省作“豎”，三豎、豎川为一地，即豢龙氏（董氏）的居地，盛产宝石，或在今南阳、唐河一带^[29]。

总之，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

族，南向墓人群为彭姓、己姓的族氏。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就是以夏族为主体的，姒姓族群与彭姓、己姓等“祝融”后裔族群的联盟。《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16]29}“崇山”即嵩山。《国语·周语下》记禹之父为“崇伯鲧”，足以说明嵩山地区是夏族的起源地。夏王朝的兴起开始于姒姓夏人与“祝融”后裔的联盟，文献记载多少透露出这一历史信息。

三、关于夏文化的概念问题

目前对“夏文化”概念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徐旭生在调查夏墟之前就认为“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而且时间上不限于夏代^[30]。1977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上，夏鼐将夏文化界定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31]。邹衡从年代、地域、文化特征、文化来源、社会发展阶段等五个方面考察，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32]。此后高炜、杨锡璋、王立新、王震中、孙庆伟等均对夏文化概念做出阐释。

夏文化是以族名来命名的，对其解读涉及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关系问题。中国先秦时期的族或族群，主要是按姓、氏来划分。“姓”是一种外婚血缘组织的符号，相当于人类学上氏族名号（gene name），其主要作用在于“别婚姻”；“氏”是“姓”的分支，其实就是宗族组织^[33]。《史记·夏本纪》说姒姓有十二氏，其中“夏后氏”以国名为氏号，为姒姓大宗、夏之王族；其他为小宗，多以地名为氏号，如有扈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或以方位为氏号，如“有男（南）氏”；或以武器为氏号，如“戈氏”。姒姓的族氏分支，应是历史上繁衍分化形成的，得名方式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本文中“夏人”或“夏族”均指姒姓族群，不包括异姓；这就和“周人”单指姬姓族群，不包括殷遗民等其他族群的定义一样。

本文也认为“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但具体内涵与前贤意见有所不同。第一层次即广义的夏文化，指夏王朝时期夏人与其他

族群共同创造、使用的考古学文化。它既包含姒姓,也包含其他氏族,当然以前者为主体。这个层次上的夏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姑且不论其年代能否代表完整的夏代。

之所以把夏文化的时间范围限定在夏王朝时期,是因为在夏王朝建立之前,还没有“夏”这一国号、族名,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夏文化。《国语·周语下》说:“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16]⁹⁶《史记·夏本纪》说:“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7]⁸²这些都说明“夏”作为国号、族名,是从夏代开始的。夏朝灭亡后,虽然夏遗民依然存在,但他们大多臣服于商王朝,与商人及其他族群共同创造、使用了商文化,完整意义的、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夏文化已经消失。这就和周灭商后,殷遗民与周人共同创造、使用了周文化,考古学上商文化已经消失的情况一样。

二里头文化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其分布西至陕西华县、商洛,东至商丘,南至信阳、南阳,西北至垣曲,东北以沁河下游为界与下七垣文化相隔^[34]。学者们考证过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地望,其中有扈氏在河南郑州北、原阳西的原武,有男(南)氏在河南南阳,斟寻氏在河南巩义,彤城氏在陕西华县,费氏在河南偃师,杞氏在河南杞县,有莘(辛)氏在伊水附近,冥氏在山西平陆,斟灌氏在河南洛水附近,戈氏在“宋、郑之间”,更接近郑地。这些姒姓部族的居地均位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唐《括地志》云褒国在陕西汉中勉县,《春秋》杜预注说姒姓缙国在“琅琊鄆县”,即山东枣庄市,地望都远在该文化范围之外。褒氏、缙氏原居地可能分别在河南息县、睢县,夏亡后很久才迁徙到陕西、山东^⑨。

《左传》《汉书》等记载“祝融之墟(墟)”在郑或新郑,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新密古城寨城址^[35]。“祝融八姓”传说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金文、帛书的证实,并非虚妄;八姓早期分布在中原及其周边,是以“祝融之墟”为中心的^[36]。八姓中彭姓、己姓与夏王朝关系密切,后世文献记载大彭始封在彭城,彭城被认为是江苏徐州,但那里在夏代属岳石文化分布区,且距洛阳盆地较远,与彭伯寿率师平定夏朝内乱的记载相悖,因此大彭氏夏代居于徐

州的说法值得怀疑^⑩。韦或豕韦是大彭之后、彭姓分支,居邑在郑州。诸、稽位置失载,可能后来迁至南方。彭姓另一分支秃姓舟人在河南新郑。昆吾之居亦在新郑。顾在郑州附近。苏、温均在河南温县。董氏在南阳。由此可见,彭姓、己姓族比较多地分布在郑州、新郑地区,还有少数分布在黄河北岸或南阳,基本上都处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

姒姓与彭姓、己姓部族的分布地望绝大多数都位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现象,印证了前文从墓向葬俗推论该文化包含这两类族群的认识。

第二层次即狭义的夏文化,指夏王朝时期姒姓夏人的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及甲类遗址属于此类遗存。它不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因为考古学文化是通过具有自身风格特点的器物群来划分的,而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和南向墓在器物上难以区分,姒姓夏人与彭姓、己姓族群共建共享同一个手工业体系,均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

第一层次夏文化是通过器物群来界定的,它包含了多个族群;第二层次夏文化可以通过墓向、葬俗来界定,是前者某个族群的遗存。第一层次包含了第二层次的夏文化,探索后者,需要在前者的框架内进行。夏文化概念的两个层次,其实是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两个不同层面的定义,了解并把握这种层次性,将有助于厘清夏代文化与族群的关系,进而探索夏代历史的真相。

注释

①参见梁云、安婷宇:《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②③参见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3页。④一般将墓向在46°~134°的归为东向,136°~214°的归为南向,216°~314°的归为西向,316°~44°的归为北向。⑤根据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3页,以及二里头遗址其他相关发掘简报、报告。另补充《二里头1999—2006(伍)》,附表5-1《墓葬登记表》,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

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2期。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262页。⑧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⑨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第1期。⑩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吉利东杨村遗址》，《考古》1983年第2期。⑪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南洼遗址2004年春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登封南洼2004—2006年二里头文化聚落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1年第6期。⑫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⑬赵海涛、许宏：《二里头的王朝气象》，《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4日。⑭赵海涛、许宏：《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年第8期。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⑱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⑲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㉑此图摘自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南洼遗址2004年春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㉒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82页；《二里头文化的首与尾》，《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320页。㉓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㉕以上五座墓葬分别参见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尹俊敏：《〈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补记》，《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董全生、李长周：《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

物》2004年第2期；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氏家族墓地M1、M2及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第10期；乔保同：《最新考古发现：南阳楚彭氏家族墓》，《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㉖于省吾说：“陶谓作范，铸谓镕金。凡古代彝器，未有不用范者，近世所发现之商周陶范，固所习见。”参见于省吾：《双剑谿诸子新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4页。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㉘《路史·国名记》引郑樵说褒在“蔡之褒信”，即河南息县东北。汉中盆地在晚商时期分布着宝山文化，可能为早期巴人的遗存，褒氏应在西周时才迁入汉中。《春秋经·襄公元年》“次于郟”，杜注“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即河南睢县。睢县与杞县相邻，文献中杞、缙经常并举，如《国语·周语中》“杞、缙由大姒”，可见二者地域邻近，足以说明《春秋》“郟”地即为姒姓缙氏的原居地。㉙《古本竹书纪年》记（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大彭氏似在商代才迁至徐州。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J].考古,1985(12):1085-1093.
- [2]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南洼遗址2004年春试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6(3):4-12.
- [3]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2819.
- [4]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J].文物,2006(8):55-62.
-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5):4-11.
- [6]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M]//《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09.
-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王符.潜夫论笺校正[M].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396.
- [9]曹定云.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从妇好墓器物铭文“戈自”谈起[J].考古与文物,1989(1):72-79.
- [10]王文华,陈万卿,丁兰坡.河南荥阳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J].文物,2004(11):61-64.
- [11]刘富良,李德方.郑州大师姑古城与夏之韦国[M]//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早期夏文化与先商

- 文化研究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28-131.
- [12]张国硕.望京楼夏代城址与昆吾之居[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84-190.
- [13]张国硕.夏代晚期韦、顾、昆吾等方国地望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2):83-89.
- [14]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19-252.
- [15]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353.
- [16]徐元浩.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7]郝懿行.竹书纪年校证[M].李念孔,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3833.
- [18]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36-737.
- [19]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1(9):4-21.
- [20]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422.
- [21]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济南:齐鲁书社,2010:4811.
-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2.
- [2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4610.
- [24]蔡运章.绿松石龙图案与夏部族的图腾崇拜[M]//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5-142.
- [25]朱乃诚.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J].中原文物,2006(4):15-21.
- [26]何笃.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禹舞的关系[J].中原文化研究,2018(4):31-39.
- [27]郜向平,覃覃.二里头遗址三号建筑院内墓葬探讨[J].南方文物,2019(2):111-116.
-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337-338.
- [29]杜金鹏.商汤伐桀之史实与其历史地理问题[J].史学月刊,1988(1):6-11.
- [30]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11):592-600.
- [31]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河南文博通讯,1978(1):32-33.
- [32]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J].河南文博通讯,1978(1):34-35.
- [33]陈絮.商周姓氏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1-36.
- [34]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33.
- [35]马世之.新密古城寨城址与祝融之墟问题探索[J].中原文物,2002(6):23-26.
- [36]李学勤.谈祝融八姓[J].江汉论坛,1980(2):74-77.

Viewing the Concept of Xia Culture from the Crowd Composition of Erlitou Culture

Liang Yun and Li Panpan

Abstract: The Erlitou culture sites containing burial rem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 B and C. Category A is dominated by north-facing tombs, category B by south-facing tombs, category C by a roughly equal proportion of north-facing and south-facing tombs, and there is a certain patter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sit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orth-facing and south-facing tombs of this culture represent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that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f this culture was dominated by the north-facing tombs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south-facing tombs. With reference to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 popularity of north-facing burials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burials of the Xia relics, it is clear that the north-facing population of the Erlitou culture was the Xia people of the surname Si. The literature also records that Wei with the surname Peng and Gu and Kunwu with the surname Ji, which were alliance of Xia.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ombs of the noblemen of the Zhou dynasty with the surnames of Peng and Ji were south-facing tombs, so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south-facing tomb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were of the Peng and Ji tribes; these tribes were good at making pottery, casting copper and turquoise. The rise of the Xia dynasty began with an alliance between the Xia people of the surname Si and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Zhurong”. The concept of “Xia culture” has two levels, broad and narrow, and is defined at the level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clan affilia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Erlitou culture; north-facing tombs; south-facing tombs; population composition; Xia culture

[责任编辑/知 然]